

看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与情爱

吴玉珍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本文对严歌苓小说中的人性与情爱进行了解读,挖掘其对人性与情爱本质的揭示。小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变迁及女性情感隐痛的细腻描写,体现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叙事伦理,也显示了严歌苓超越世俗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人性 情爱 女性视角 严歌苓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2-0098-03

随着小说《扶桑》、《金陵十三钗》、《人寰》、《天浴》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上海文学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佳实验小说奖”等国内外文学大奖,严歌苓享誉北美华语文坛并成为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生于上海、长于安徽,有过 16 年的文艺兵和战地记者的生涯。上世纪 90 年代移居美国后,其潜在的创作才情爆发,并多次在港台获奖。世纪之交其创作在大陆引起关注,作品除多次获奖并被拍成电视剧,而且被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第五代导演看好,购买其电影版权。评论家饶芃子认为“严歌苓是近十年来北美华文创作成就最为显著的作家”^[1]。

严歌苓在移民前就著有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因此,她的创作就比同时期的新移民作家有较高的艺术起点。她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作品语言灵动、俏皮、细致,去美后入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系读研,建立起一种世界性的视界,大量吸收外来文学的营养,使作品多了层西方小说的细腻和情绪流动。再加上 20 年异域生活的深切体验,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转化为独特的审美追求,无异一种“生命的移植”(严歌苓语),遂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

一、独特的女性书写视角

严歌苓早在《扶桑》、《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中就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和关照,来表现现代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无论是从 20 世纪初被贩卖到美国的扶桑到世纪末的第五代留学生,还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战火纷飞的旧上海女生到建国后女性的情感经历,女性的牺牲与奉献、坚韧与痛苦、挣扎与包容,始终是严歌苓笔下一曲不衰的清音,表现了女性特有的性别意识、现实欲望、以及灵魂的震颤与爱情的悱恻,体现女性创作视角对人性内涵挖掘的深度。

在最新长篇《寄居者》中,严歌苓从女性视域的书写立场出发,以一种截然不同于现当代文学宏大叙事的叙述特色进入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上海,以“我”(唐人街出生,上海成长、念书的美籍华人)——May 的经历为线索,展开了一场人性与爱欲交织纠结的博弈。文本以第一人称自传式叙事展开,“我”是复旦大学的大二女生,某一天邂逅了流亡到上海的犹太青年彼得·寇恩,一见钟情。为了拯救彼得的生命,“我”先是强迫父亲为彼得办进入美国的签证,未果;后又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前往旧金山偶遇另一犹太青年杰克布·艾德勒,想出掉包计,将杰克布诱至上海,利用杰克布对自己的爱偷出其护照给彼得。在作品中,个体价值叙述不再依附于宏大历史叙述法则,个体生命经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青睐。在此的寄居者——“我”、彼得、杰克布等生命个体是交融于历史体验与历史记忆中的生命个体,而彼时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1938 年大批犹太难民登陆上海以及随之而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希特勒党羽对于逃亡上海犹太人的处死方案)、“太平洋战争”爆发等却不作为重头戏,只是以简约的文字在个体生命的穿插中通过“我”的视觉、听觉——个性化女性视野来书写。“我”通过杰克布被抓坐牢、彼得拒绝救治手术室中弹的清洁工等事件,完成了对彼得人性堕落的认识过程,最终留在上海。

严歌苓以独特的女性视域,来展现与主流历史保持一定距离的女性生存空间。作家的历史书写与文学叙事,已不拘囿于传统的主流历史叙事的框架,它既不同于“五四”以来中国主流文学中那种启蒙、理性叙事为主的特色,也不同于建国三十年来文学中那种排斥个体价值的政治话语叙事特色。而是以带有历史追忆的个人化书写记录了一段爱情的幻灭,吻合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多元化的叙事手法,体现了作者在多元整合的文化立场下,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

* 作者简介:吴玉珍(1966—),女,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人性变异现象的深刻反思。

二、人性的回归

桑塔格说过：“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或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人赞许的。……严肃的小说家是实实在在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2]严歌苓为什么二十年来写作一直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键在于作家二十年来都在思考她曾有过的经验，以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精神的覆盖，在想象、经验和女性视角之间，发现人性与道德存在的种种可能性。而严歌苓在经验和叙述之间，是有很高的想象力的，所以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和语言不仅精彩、鲜活、生动而且蕴含了作品有关灵魂状态的考证，特别是作品对人性探索的深度和犀利，都令读者震颤，能引起情感共鸣，这也是其作品持续走红的一个明证。

严歌苓以女性特有的笔触描写人性的种种。对在非时空状态下人性会出现怎样的变异和伸展也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她说：“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蔽。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3]《寄居者》中的道德指涉具有深厚的意蕴。寄居者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会有怎样的变数？在正常社会形态下人性总是显露出它美好的一面，而人性中恶的部分则被隐藏不会浮出水面。1942年的人性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困境，彼得如果不是处于1942年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我”可能不会发现彼得人性中自私冷血的一面。“我”四处活动、疲于奔波，是为了一己爱欲实施掉包计；而杰克布刚登陆上海入关时被日本宪兵打了两耳光，他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还以玩笑的方式自我解嘲，实际上已经种下了抗日复仇的火种，最终杰克布以自己的尊严和正直的人格赢得了“我”的人性的全面回归。“我”在最后拿到杰克布的护照能跟彼得一起奔向幸福、安全之地——旧金山之时却放弃了彼得，选择留在战乱中的上海，显示了对人性真善的回归与执著。

文中同为寄居者的两个犹太青年形成鲜明对比。杰克布初始留给人们的印象不佳，打弹子、玩股票、私贩罐头，好玩而且欠下赌债。既不像彼得那样认真、踏实向上，也不像哥哥们那样出类拔萃，是“犹太种族的败类”（杰克布父亲的评价），在“我”眼里也是根本没法和彼得相提并论的“人渣”。但表象遮盖下的杰克布非常聪明、机灵，心底善良，富有人情味，而且勤于思考，他在想“关于迫害，他企图想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他天生有权利迫害另一些人。为什么只有对他人迫害了，他才觉得自己高大，有力量、正义”^[4]而这也是“我”能跟他沟通，有共同点的地方，“因为‘我’也常常钻牛角尖地追问人类从来不断的各种迫害到底是怎么回事”^[4]。杰克布为把“终极解决”的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参与干涉而被捕。这是一位正直的不仅为了中国的抗日事业英勇献身，也为了使自己同胞免遭捕杀而积极奔走解救的犹太英雄。杰克布如果没来到上海，在旧

金山依然会过着平凡的生活，正是因为来到了素有“国际难民营”之称的上海，一个危机与希望、浮华与饥饿、压迫与反抗并存的东方大都市，杰克布人性中正直善良、英勇抗争的天性开始苏醒。与其说杰克布是为了逃债和“我”私奔，不如说是拒绝命运对他的安排而想把幸福攥到自己手中，这样的人生只有融入到1942年上海的浦东机件厂，成为新四军的亲密“战友”，他才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相较而言，像彼得这样优秀的医科大学生在同胞被杀的危难当头，却干着囤积粮食、投机倒把、走私药品之事，仅仅是为了一己和家人的利益，暴露了人性中自私庸俗、市侩的一面。作品将人性置于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检验，彼得由认真向上的有为青年堕落为投机者，杰克布由好玩子弟变为抗日英雄，而“我”也由陷入情爱中任性的少女变为理智、自尊的觉醒者。

“对人性的审视、剖析和反省，是严歌苓小说的创作核心和兴趣所在。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与母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魅力，从情感和欲望的两难层面彰显出人性的力量。”^[5]在早期小说《少女小渔》中，小渔千里迢迢来到纽约，为了留在美国（小说中为悉尼），被男友江伟安排“嫁”给一落魄的意大利老头以得到绿卡。她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为自己爱的男人牺牲掉尊严和自我，但江伟却把她的善良当做一种习惯、一种依赖和欲望的需求。不断地为难、苛责小渔，对假结婚的意大利老头也是以恶抗恶，显露出人性中自私庸俗的一面。初始意大利老头也屡次从小渔身上捞好处，对此双重压迫，小渔不但没有抱怨，反而处处展现人性的美好光辉。对江伟她温存体贴，对意大利老头她真诚相处，在龌龊不堪的环境下依然真心向善，体现了东方女性吃苦耐劳的美德。小渔的勤劳、善良、忍让、真诚最终使自私的洋老头惭愧并走上街头拉琴卖艺自食其力，完成精神上的救赎。“是小渔真诚的关心使老头由‘畜生’变回了人。正是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染下，洋老头逐渐除去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日益恢复了人的尊严，他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6]正是小渔善良纯真的品性涤净了老头身处异国他乡的飘零与屈辱，以她的平和勤劳克服了异域强势文化带来的自卑，在艰难的境遇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性之美。严歌苓用“独到的眼光寻找着人的理想人格，发掘着生命的真意，对异化人性的文明的鄙夷与对人的本性的尊崇使我们看到了严歌苓超越世俗的人文关怀。”^[7]

三、对情爱的揭示

文学中的爱情描写曾经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不谈爱情”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它反映了当下社会人对爱情、婚姻的麻木与消极。但爱情却是严歌苓作品中一个重要的话题。虽然爱情总是有时代和政治的大背景，大背景又总是在作用或者影响小人物的爱情。在《寄居者》中，严歌苓将笔触深入到二战期间的上海，围绕一女两男的爱与欲的纠葛，展示了战争年代里各色人种的“寄居”命运。作品除延续了严歌苓独特的自叙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外，还采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文本中的“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独立自主，敢爱敢恨，有一点玩世不恭，有时又很任性大胆。为了使彼得脱离“终极解

决方案”的险境,不惜昧着良心以牺牲杰克布来换取彼得的安全。虽然做法不地道,却能读出小女子爱的执著与痴情。

2004年严歌苓随派驻尼日利亚的丈夫来非洲定居,在那里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以灵动的文字讲述了田苏菲在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竭尽心智守护自己爱情与婚姻的动人故事。1947年,十六岁的中学生田苏菲为了浪漫激情的生活,离家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文工团员。她没有嫁给喜欢她的旅长都汉,却爱上了“集狷狂、柔弱、放荡不羁、细致入微于一身”的政治干事欧阳萸。虽然嫁给了他,但是小市民出身的田苏菲,却不是上海世家出身、心地清高的欧阳萸能倾心的。这样的婚姻,对田苏菲而言,极具压力和危机感,她只能用加倍的奉献去克服危机。为了走近欧阳萸,田苏菲从最灿烂的青春,到渐归平淡的中年,30多年来不管政治上的风云突变一意维护自己爱情。田苏菲的爱既不盲目也不功利,而是真情的选择,在她眼光所及的世界里,只有欧阳入了眼,吻合了她的审美标准,正因如此,她对欧阳萸的爱情就近似于一种宗教情感,一种高于自我存在的最神圣情感,其顶点就是牺牲精神。尽管这种沉实而具体的爱被只有12岁的女儿毫不留情地界定为“妈妈爱爸爸,爱的太笨!”。但最终她的爱赢得欧阳萸的死心塌地。这就是一个女人谱写出的一首伟大的爱情史诗。严歌苓认为,只要曾真心去爱过,没有任何一样痛苦是不值得的,所有的伤害都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使得人的心灵愈加丰富。而

执着的追求过,痴迷过的人,更懂得爱情的美好,更懂得去爱,才没有枉费这一场繁华而盛大的生命。

严歌苓的写作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作品通过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变迁及女性情感隐痛的细腻描写,体现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一定的叙事伦理。小说叙事意义在于,不仅仅讲述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故事,而是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进行富有寓意的升华,而这种升华的内在底蕴使我们看到了严歌苓超越世俗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饶芃子,陈瑞琳.“歌”者之歌之序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文坛随想录[J].2004(1).
- [2]桑塔格.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9:218-219.
- [3]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J].南方作家,2002(1):29.
- [4]严歌苓.寄居者[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109.
- [5]刘惠丽.女性与人性的对话——谈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J].唐都学刊,2008(4):103.
-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58.
- [7]王文璨.柔韧的赞歌——浅析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中女性形象[J].合肥:安徽文学,2009(9):5.

(上接第97页)作用。王小盾教授就曾撰文《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就这方面的问题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东干第二代诗人十四儿,在众多东干现实主义作家中显得异常特别。因为他的诗作试图表达一些现代性的主题,比如对生死的考虑、对时间的焦虑意识、对孤独的彻骨体验等。“当他企图用东干诗歌表达死亡、永恒、历史、孤独等主题的时候,作为创作基本条件的东干语文,便成了他的镣铐。他不得不对旧意象加工,通过意象联结、延长、散文化等方式来创造新意象。”^[9]王小盾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对诗的某种特定认识:诗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日常语言,诗要超越口语。他还对汉语书面诗与十四儿的诗歌作对比,认为十四儿为了不因同音字发生歧义,不得不将汉语的书面语改成拖沓的口语,从而牺牲了诗歌的紧凑。当然,在这种分析背后也透露出作者的评价标准:书面语较之口语要更为凝炼、进步,更接近诗的本味。这些意见中还有值得商榷之处,诗歌是否有诗味并不在于它用口语还是书面语,书面语也会因其长期的固定性而显现出表达能力退化的现象,反倒一些口语更为生动、更有表现力。

东干文通过书报、广播、文学作品等载体在东干已经广泛使用了70年,渐臻成熟,它有完善的正字法、标点法系统等,证明了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是完全可行的。东干拼音文字为保持东干的民族独立性、保存与发展东干的文化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东干语是汉语方言的变形,所以它的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文字的建立有重大的参考价值”^[10]。

参考文献:

- [1]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3]丁宏.东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5]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 [6]林涛.东干语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 [7][联邦德国]吕恒力.30年代苏联(东干)回族扫盲之成功经验——60年来用拼音文字书写汉语北方话的一个方言的卓越实践[J].语文建设,1990(2).
- [8]赵塔里木.中亚东干民歌的传承方式[J].音乐研究,2003(1).
- [9]王小盾.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J].文学遗产,2001(6).
- [10]杜松寿.拼音文字参考资料集刊:东干语拼音文字资料[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